

多重挑战下欧洲中右翼政党的纲领性“右转”

——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例*

郑春荣 王妍俐

内容提要:政党如何发展以及为何变革是政党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在欧洲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加剧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涌动的多重挑战背景下,欧洲中右翼政党相继通过纲领性“右转”予以应对。通过拓展政党变革的整合理论模型,本文构建了由“外部环境因素”与“核心机制”构成的政党变革综合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为案例,采用政党纲领文本分析与政治过程追踪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基民盟在经济政策、社会文化政策以及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均呈现“右转”趋势,但程度各异。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右转”最为显著,社会文化政策领域次之,经济政策领域变化幅度相对较小。选民偏好向“议题政治”的转变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议题竞争导致基民盟在选举中失利,进而引发党内主导派别更替和领导层变动,最终推动了政党纲领性的“右转”,而俄乌冲突等重大突发事件加速了这一过程。“右转”政策虽有助于德国基民盟等欧洲中右翼政党在短期内突破选举困境,但其长期有效性取决于这些政党能否通过“右转”切实提升执政效能。

关键词:欧洲中右翼政党 德国基民盟 纲领性转变 政党变革

一 引言

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人民党党团(EPP)^①遭遇重大挫折,席位较上届选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批准号:20VQG011)的阶段性成果。

① 1976年该组织成立时的主要成员为基督教民主党,后来扩大至持自由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和其他中右翼政治观点的政党。目前,该党团成员包括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西班牙人民党、法国共和党、意大利力量党、波兰公民纲领党、奥地利人民党、荷兰基督教民主联盟、瑞典温和党、芬兰民族联合党、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等在内的欧盟各国的中右翼政党。这一广泛的成员结构确保欧洲人民党党团代表了欧洲中右翼政治的多样性,作为中右翼政治力量的核心协调机制,其立场变化能够反映成员党在意识形态与政策实践方面的集体调适。

举减少 34 席,而亲欧盟的自由派、绿党以及反欧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显著扩大其影响力。202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为了赢回流失的选票,欧洲人民党的竞选纲领呈现明显的“右转”倾向。例如,该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欧洲一体化传统的同时,显著强化了移民管控的“堡垒欧洲”叙事、调整绿色转型路径以平衡经济竞争力,并强调增强军事力量以维护欧洲安全。

这一现象反映出欧洲政治生态的深刻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右翼政党(又称主流右翼政党)在欧洲现代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长期作为“中间化”力量,平衡左翼与极右翼;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缓解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在移民和文化冲突问题上采取温和立场,避免社会极化。此外,以基督教民主党为代表的中右翼政党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动者,在一体化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可以说,战后西欧自由主义民主的繁荣兴盛离不开中右翼政党的支持。然而,近年来各国中右翼政党普遍面临支持率大幅下降的困境,迫使其纷纷寻求转变。在政党格局碎片化与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相关研究往往聚焦于两类问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如何影响政治格局与主流政党,以及主流政党如何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挑战。^①既有文献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讨论较多,而对主流政党应对策略的探讨则起步较晚,其中对主流左翼政党变化的关注也远大于主流右翼政党。^②然而,中右翼政党很可能面临比中左翼政党更具破坏性和持久性的挑战。这是因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中右翼政党在政治光谱上的邻近,使得前者势力扩大将直接侵蚀后者的传统选民基础。

有鉴于此,本文聚焦欧洲中右翼政党的政策立场转变问题,尝试分析其转变的方向、程度与动因。与政党政策立场研究的主流方法一致,本文认为,政党纲领作为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的文本载体,^③在分析政党政策立场变迁方面具有基础性价值。其中,基本纲领作为政党的长期意识形态框架,承载着政党的核心价值与身份认同,对内整合功能最为突出;竞选纲领则主要发挥对外宣传、形象强化和选民动员的功能,并为政党制定具体政策提供依据。^④因此,将基本纲领和竞选纲领结合进行分析,能够较

① Tarik Abou-Chadi and Werner Krause, “The Supply Side: Mainstream Right Party Policy Positions in a Changing Political Space in Western Europe,” in Tim Bal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ds., *Riding the Populist Wave: Europe's Mainstream Right in Cri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67.

② Ibid.

③ Elmar Wiesendahl, “Die Erforschung der Binnenorganisation von Parteien,” in Elmar Wiesendahl, ed., *Parteienforschung: Ein Überblick*, Springer VS, 2022, pp.281–282.

④ Heino Kaack,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des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s*,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1, pp.401–403.

为全面地把握政党政策立场的变化轨迹。

在对中右翼政党政策立场转变的方向与程度进行分析后,本文关注其政策立场转变的动因。基于哈默尔(Robert Harmel)与琼达(Kenneth Janda)的政党变革整合理论(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Change),本文构建了一个政党变革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强调,不同类型的环境因素通过驱动政党变革的核心机制,带来政党政策立场的转变。哈默尔与琼达指出,政党变革在原则上是选举冲击、党内主导派别更替和领导人变化的结果。当涉及立场变化时,环境因素也需要纳入考量。^① 据此,本文关注选民偏好的转变(环境趋势)、新兴政党的议题竞争(环境调整)和突发环境事件这三大环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探究其如何引发组织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并最终导向政策立场的转变。

本文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以下简称“基民盟”)的纲领性转向为案例,根据上述理论框架,采取过程追踪法进行分析。该案例展示了外部环境因素驱动组织内部权力变化,并最终导致政党政策立场转变的作用机制,为理解欧洲中右翼政党的政策立场转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分析视角。此外,鉴于基民盟已重新执政,研究该案例对预判德国新政府的政策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政党变革的理论分析框架

政党转变政策立场的原因属于政党变革的研究范畴,国内外研究普遍呈现多因协同的解释范式。总体而言,政党变革并非由单一机制驱动,而是外部环境压力和内部权力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考察外部因素对政党变革影响的研究中,社会环境、选举理性和议题所有权构成最常见的分析维度。^② 而从政党内部视角切入,派系竞争、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则被视为驱动变革的重要动力。^③ 为全面理解导致政党变革的

^① Robert Harmel and Kenneth Jand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6, No.3, 1994, pp.259–287.

^② Tim Bal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The Mainstream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Caught Between the Silent Revolution and Silent Counter-Revolution,” in Tim Bal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ds., *Riding the Populist Wave: Europe’s Mainstream Right in Crisis*, pp.1–37; Zeynep Somer-Topcu, “Timely Decisions: The Effects of Past National Elections on Party Policy Chang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1, No.1, 2009, pp.238–248; James Adams et al., “Understanding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Party Ideologies: Do Parties Respond to Public Opinion or to Past Election Resul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4, No.4, 2004, pp.589–610.

^③ Tim Bale,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fter Brexit: Turmoil and Transformation*, Polity Press, 2023; Gijs Schumacher et al., “Why do Parties Change Position? Part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centiv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5, No.2, 2013, pp.464–477.

路径机制,需要整合外部环境与内部组织这两个视角。

(一)政党变革的整合理论:引发变革的核心机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哈默尔和琼达在帕内比昂科(Angelo Panebianco)、德舒韦尔(Kris Deschouwer)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政党变革的整合理论。他们将政党变革解释为政党在组织、战略以及意识形态/政策立场多个维度上发生的根本性变化,^①从而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分析框架。同时,他们认识到政党变革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环境决定论倾向,因而提出将政党内部因素纳入整合理论。由此,哈默尔和琼达搭建了一个包含两个内部变量(主导派别更替和领导人变化)以及一系列外部变量的理论模型,并区分了由权力追求驱动的党内变革和由目标驱动、主要源于外部环境压力的党派变革两种变革驱动机制。两位学者对党内因素和党内变革机制的探讨较为深入,认为在权力追求的驱动下,主导联盟构成的变化和政党领导人的更替本身足以引发党内变革,但这一变革主要存在于组织层面,对立场层面的影响有限。^②相比之下,模型中的外部变量包含了文献中认定的众多重要“环境变化”因素。对此,哈默尔和琼达通过将这些外部因素与政党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的实现程度相联系,构建了一条由目标驱动的政党变革分析路径。他们将政党的主要目标分为四类:选票最大化、公职最大化、政策倡导以及党内民主最大化。^③拥有不同目标的政党对外部冲击的敏感度存在差异,例如选举失败对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党冲击最大。因此,当以选票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政党遭遇选举失利时,该党会对自身策略的有效性进行重新评估。当这种程度的外部冲击与领导人更迭和主导派别的变化同时发生(这些变化也可能由冲击本身引发)时,目标驱动与权力追求便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政党在立场和组织层面发生变化,并为政党进行广泛而根本性的变革创造了最佳条件。^④总之,哈默尔与琼达提出的政党变革的整合理论模型确立了政党变革的核心机制,该机制由外部冲击、党内主导派别更替和领导人变化这三个变量构成。

哈默尔与琼达的理论为政党变革研究提供了一个简洁而有效的分析模型。然而,他们也认识到,在实证研究中,仅仅识别选举失利等冲击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近期的

① Robert Harmel and Kenneth Jand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p.266.

② 哈默尔和琼达认为,目标驱动的变革比权力驱动的变革更具争议性,也更难实现。因为权力驱动的变革是党内事务,而目标驱动的变革会吸引党内各类行为体和公众的参与,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辩论和决策,因此常常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参见 Robert Harmel and Kenneth Jand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pp.279–282.

③ Ibid., pp.272–273.

④ Ibid., pp.267–282.

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选举失利甚至并非政党发生重大立场变化的必要条件。^①由于整合理论模型在解释政党立场转变时仍存在不足,其既无法解释政党立场转变的方向,也无法理解其转变的程度,因此,有必要对模型进行适当修正,使其成为更能充分解释政党立场转变的理论框架,并深入探究其主要条件及各条件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整合理论中,哈默尔与琼达将关键的“环境变化”概念细分为三类:环境事件(environmental event)、环境调整(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与环境趋势(environmental trend)。环境事件指发生在特定时间或时期内且有公开记录的具体事件,例如罢工或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它包含一种特殊类型的环境事件,即“冲击”。环境调整指政党运行环境中发生的可识别的规则变化,如新选举法案的出台。环境趋势则指无法明确识别的、日常发生的环境变化,单独来看可能微不足道,但当它们持续累积并达到可衡量规模时便具有重大意义,例如选民偏好的长期缓慢转变。^②然而,哈默尔与琼达对环境变化的探讨止步于分类描述,并未提出更多理论假设。后续研究虽继承了他们对环境变化因素的广泛探讨,但鲜有研究对不同类别的环境因素进行系统性区分,或是专注于某一特定类别,^③或是将所有环境因素当作相互独立的变量加以分析。^④

因此,基于哈默尔和琼达的整合理论模型,本文拟进一步深化对环境类别因素的考察,指出环境趋势、环境调整和环境事件这三种类别的环境因素之间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层级传递关系。这些外部因素通过与内部因素的复杂互动,共同驱动政党政策立场的最终转变。

(二)推动核心机制运行的外部环境因素

政党变革理论植根于对环境趋势的历史性考察,因此,本文同样将社会环境趋势作为考察政党纲领性立场转变的起点。在社会与政党关系研究中,李普塞特(Seymour

① Robert Harmel et al., “Manifestos and the ‘Two Faces’ of Parties: Addressing Both Members and Voters with One Document,” *Party Politics*, Vol.24, No.3, 2018, pp.278–288.

② Robert Harmel and Kenneth Jand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pp.276–277.

③ 例如一项对1990年德国统一后基民盟政策纲领变化的研究发现,德国社会在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和女性经济地位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促使其在福利、移民、家庭等领域做出政策调整。这三项原因显然都属于哈默尔和琼达所认为的“环境趋势”。参见 Simon Green,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ammatic Change in the CDU,” *German Politics*, Vol.22, No.1–2, 2013, pp.46–63。另参见 Marc Debus and Jochen Müller, “The Programmatic Development of CDU and CSU since Reunification: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for Changing Policy Positions in the German Multi-Level System,” *German Politics*, Vol.22, No.1–2, 2013, pp.151–171。

④ 此类现象多见于比较研究,例如一项对西欧社会民主党是否以及为何发生生态变革的研究将绿党的成立、关键竞争党向生态主义的转变、之前选举的失利、领导人的更换以及邻国姊妹党向生态主义的转变五个因素作为相互独立的变量,探寻社会民主党实现生态变革的路径。参见 Andreas Fagerholm,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and the Rise of Ecolog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14, No.5, 2016, pp.547–571。

Martin Lipset)和罗坎(Stein Rokkan)的“社会分歧理论”(cleavage theory)具有深远影响。该理论将现代政党体系的形成锚定于工业化进程中固化的社会分歧,包括中心—边缘、教会—国家、农村—城市和资本—劳动四组结构性矛盾,而选民与政党的结盟(alignment)便建立在这些分歧的基础之上。^①然而,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引发了社会分歧的根本性转型:阶级界限因福利国家扩张和职业结构多元化而日益模糊,宗教分歧在世俗化进程中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诸如多元主义与本土主义、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对立的文化价值分歧,并成为新的政治竞争主轴。这种分歧转型重塑了选民结构,致使传统基于阶层或信仰的稳定选民群体逐渐瓦解,代之以文化认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流动选民群体的崛起。这一趋势促使选民的投票逻辑从“政党认同驱动”转向“议题政治驱动”。在政党认同弱化的背景下,选民不再依赖长期党派忠诚,而是根据具体议题立场与自身偏好的匹配度做出选择,使得议题所有权成为关键机制。选民偏好的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政党纲领的功能演变,传统的“推销型”(selling)党纲逐渐向遵循市场导向逻辑的“营销型”(marketing)党纲发展,后者以选民偏好为出发点设计政策方案。^②这种转变要求政党从“供给导向”转为“需求导向”,通过民意调查等工具捕捉选民关切,将党纲转化为迎合市场需求的“政治产品”。因此,可以预计,选民偏好的转变会迫使政党重新校准其纲领性政策立场,以追求更高的支持率。

霍赫(Liesbet Hooghe)和马克斯(Gary Marks)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新兴政党的崛起构成选民偏好与传统政党政策立场转变之间的必要环节。他们基于社会分歧理论指出,传统政党转变政策立场的努力常常受到政策承诺、品牌声誉以及既有社会利益的制约,因而对新兴的社会分歧通常采取忽视态度。相比之下,新兴政党往往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到社会分歧转型与选民偏好的变化,并据此迅速积累支持,从而对传统政党构成选举压力。^③这一过程也与政党的主要目标以及各国政治参与门槛的高低紧密相关。在欧洲许多国家存在中等或较高政治参与门槛的情况下,当新兴政党尚未突破这一门槛时,选民偏好的转变无法直接对传统政党的核心目标——选票产生实质性影响,传统政党缺乏转变政策立场的动力。然而,一旦新兴政党成功进入政治体系且支

①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The Free Press, 1967, pp.1-64.

② David M. Farrell and Paul Webb, "Political Parties as Campaign Organizations," in Russell J. Dalton and Martin P. Wattenberg, eds.,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02-128.

③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Cleavage Theory Meets Europe's Crises: Lipset, Rokkan, and the Transnational Cleavag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5, No.1, 2018, pp.109-135.

持率不断攀升,直接威胁到传统政党的选票基础时,便产生了推动传统政党变革的强大驱动力。在此背景下,传统政党政策立场的转变往往是围绕新兴政党所强调的新社会分歧而展开的。相关研究一再表明,政党若能在其拥有优势的议题上进行集中宣传,便可在选举中获得竞争优势。^① 因此,为了在选举中赢回流失的选民,传统政党必须在新社会分歧的维度上与新兴政党展开议题竞争。可以预计,新兴政党的竞争将强化传统政党调整其纲领性政策立场的动力,以夺回议题所有权。

在选民偏好转变和新兴政党竞争的双重背景下,传统政党若未能及时响应这一趋势,将导致选民因议题立场不匹配而转向新兴政党,进而造成传统政党支持率持续下滑,选举失利便成为难以避免的结果。对于以选票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政党而言,选举失利构成的冲击,属于推动政党变革的重要环境事件。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选举失利事件都构成冲击,执政成本导致的支持率下降通常被排除在外。只有当传统政党遭遇的选举失利被其内部行为体归咎于新兴政党的成功挑战时,才会触发自身政策立场的实质性改变。^② 此外,由于战争等环境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其可能在政党变革模型的任一环节发挥作用,因此这类事件对公共舆论中议题显著性的变化往往产生短暂但强烈的影响。^③ 长期来看,突发环境事件的影响并不会完全消失,反而可能成为推动环境趋势演变的起点,如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被霍赫等学者视为新的跨国分歧形成的转折点。^④ 总之,可以预计,特殊环境事件构成的冲击将为政党变革开启机会之窗,而突发环境事件在长期维度上则可能与环境趋势的演变息息相关。

综上所述,选民偏好的转变通常无法直接作用于传统政党政策立场的转变。由于传统政党建立在固有的社会分歧基础之上,并受到品牌声誉等因素的制约,其对选民偏好的转变往往缺乏敏感性。当在新社会分歧维度上拥有议题所有权的新兴政党成功进入政治体系并取得较高的支持率时,传统政党才会面临实质性压力。部分传统政党可能意识到威胁而迅速转变政策立场,另一部分则可能在后续大选中遭受选举失利、党内各行为体认识到新兴政党对本党主要目标的重大影响后,才被迫转变政策立场。所有外部环境因素最终均需通过影响内部因素产生作用,选举失利这一冲击尤其

① John R. Petrocik et al., "Issue Ownership and Presidential Campaigning, 1952-2000,"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8, No.4, 2003, pp.599-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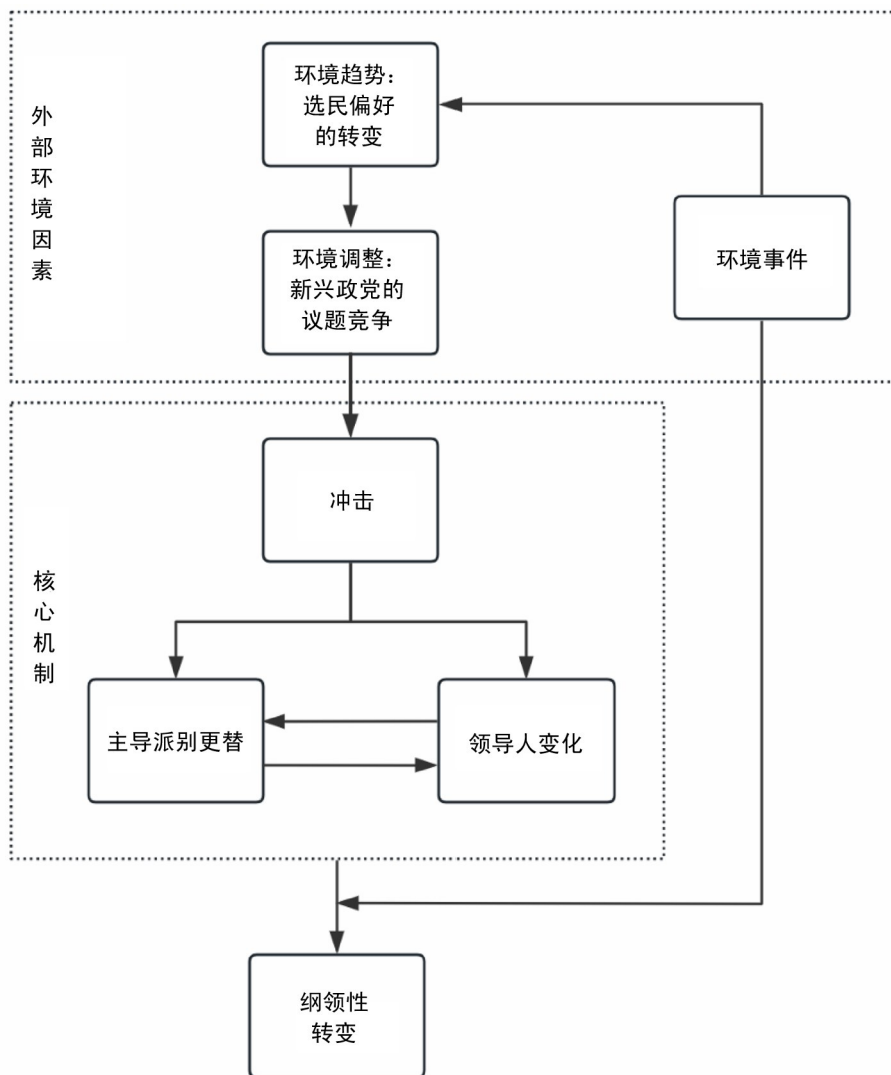
② Robert Harmel and Lars Svåsand, "The Influence of New Parties on Old Parties' Platforms: The Cases of the Progress Parties and Conservative Parties of Denmark and Norway," *Party Politics*, Vol.3, No.3, 1997, pp.315-340.

③ Lars-Christopher Stövsand et al., "Issue Salience and Vote Choice: A Cultural Turn?" in Rüdiger Schmitt-Beck et al., eds., *The Changing German Vo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82-83.

④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Cleavage Theory Meets Europe's Crises: Lipset, Rokkan, and the Transnational Cleavage," pp.109-135.

能够推动党内派系力量重组和领导人更迭,并开启变革议程。突发的环境事件则会起到强化和加速变革的作用,最终导致政党的纲领性政策立场发生变化(见图 1)。为验证这一理论假设,下文将选取基民盟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以展示在政党变革的综合理论模型中,各个行为体间的互动过程。

图 1 政党变革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



注：图由作者自制。

三 案例分析:基民盟的纲领性“右转”

本文采用传统的左右意识形态维度来衡量政党的立场转变方向。博比奥(Norberto Bobbio)曾从理论层面对左右分野进行深入探讨,认为“左”和“右”的核心在于围绕平等理念形成的对立政治意识形态。^①这一维度构建了政党系统,最初体现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歧结构中。尽管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日渐复杂且新议题不断涌现,国内政治冲突逻辑呈现多维度特征,但政治心理学、政治行为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众多研究表明,左右翼分野在公众舆论和政党政治中仍然保持着广泛影响力。尤其是一项针对1945—2020年34个西方民主国家政党的长期跨国比较研究表明,左右维度的核心(“对平等的态度”)具有跨时空的普遍解释力,能够随着时间和地域变化吸纳新议题(如环境问题、欧洲一体化),带来左右意识形态的动态演变,并仍是衡量政党立场的根本依据。^②众多政治心理学研究也为左右维度在新议题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撑。^③诺埃尔(Alain Noël)和特里安(Jean-Philippe Thérien)进一步指出,政党的左右意识形态影响已广泛渗透至外交、安全、移民、欧洲一体化和对外援助等政策议程中。总体而言,推动平等、劳工权益、国家经济干预、和平主义、多元文化、环保主义,且对主权让渡成本敏感度较低和强调扩大对外发展援助的政党,与倡导自由竞争和有限政府、强化军事力量、维护传统道德、强调爱国主义、对主权成本高度敏感以及提倡缩减对外发展援助的政党形成鲜明对比。^④诚然,在某些具体的政策领域,左右维度未必能完全涵盖所有的变化趋势,但从宏观把握政党意识形态动态演变的角度观之,通过左右维度衡量政党的纲领性立场转变是恰当且适用的。

选取基民盟作为分析案例,主要基于其在欧洲中右翼政党谱系中兼具典范性与特殊性。作为欧洲人民党的创始成员与最大执政党,基民盟不仅是“基督教民主模式”的标杆,更通过默克尔长达16年的“中间化”路线定义了21世纪中右翼政党的主流范式。同时,它与众多欧洲中右翼政党一样,在应对全球化、移民潮等挑战时,面临支

① Norberto Bobbio, *Left and 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 Polity Press, 1996, pp.60-71.

② Detlef Jahn, “The Changing Relevance and Meaning of Left and Right in 34 Party Systems from 1945 to 2020,”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21, No.3, 2023, pp.308-332.

③ Brian Rathbun, “Towards a Dual Process Model of Foreign Policy Ideology,”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Vol.34, 2020, pp.211-216.

④ Alain Noël and Jean-Philippe Thérien, “Left and 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a Global Distinction,” in Jonathan Leader Maynard and Mark L. Haas,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outledge, 2023, pp.249-266.

持率大幅下滑的困境。其特殊性则体现在德国独特的历史记忆,20 世纪极右翼势力曾给该国带来沉重灾难,使得基民盟对极右翼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一特殊历史背景赋予基民盟的“右转”行为以重要意义,凸显其背后动因的复杂性与深刻性。相较于其他欧洲中右翼政党,基民盟这一案例具备更为完整的情境脉络和时间发展线索,能够更有效地展现政党在复杂政治环境背景下发生变革的完整机制。此外,在国家层面,基民盟已再次成为主要执政党,默茨当选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在与社会民主党 (SPD, 以下简称“社民党”) 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①中,基民盟成功推行了部分右倾政策,这些政策将对德国未来 4 年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方向产生关键的导向作用。在欧盟层面,德国是欧洲经济引擎与欧盟核心国家,默茨总理已在欧洲人民党党代会上承诺,未来德国将为欧洲投入大量精力并发挥领导作用;本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洲人民党党团主席韦伯 (Manfred Weber) 均来自德国联盟党 (基民盟/基社盟)。因此,基民盟的立场转变将直接牵动欧洲政治经济议程的右转倾向,如削弱欧盟气候雄心、收紧共同庇护政策等,其案例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跨国比较参照价值。深入剖析该案例,有助于揭示欧洲中右翼政党在类似情境下的发展演变规律,以及“默克尔遗产”解体对欧洲政治秩序的结构冲击。

本文通过对基民盟在默克尔时期 (2007 年)^②与默茨时期 (2024 年)^③的基本纲领,以及联盟党在默克尔时期 (2005 年、2009 年、2013 年、2017 年) 和默茨时期 (2025 年) 的竞选纲领^④进行比较分析,旨在研判基民盟在经济、社会文化 (包含移民与融合政策)、外交与安全三大政策领域是否发生了纲领性“右转”。选择这三大政策领域进行重点考察基于以下核心考量:首先,经济与社会文化维度是界定政党在左右翼光谱中定位的核心指标,其共同构成政党意识形态的经典框架;其次,经济衰退强化了基民盟在经济领域所面临的政策张力,^⑤通过对比该党在经济与社会文化领域的立场变

① CDU, CSU und SPD, “Verantwortung für Deutschland: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SPD,” https://www.koalitionsvertrag2025.de/sites/www.koalitionsvertrag2025.de/files/koav_2025.pdf.

②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Freiheit und Sicherheit. Grundsätze für Deutschland,” <https://www.kas.de/documents/252038/253252/Freiheit+und+Sicherheit.+Grunds%C3%A4tze+f%C3%BCr+Deutschland+%E2%80%93+Das+Grundsatzprogramm+%28Quelle%29.pdf/5f72a0b2-5c95-01ad-092f-0039ff40c168?version=1.1&t=1685619912651>.

③ CDU, “In Freiheit leben: Deutschland sicher in die Zukunft führen,” https://www.grundsatzprogramm-cdu.de/sites/www.grundsatzprogramm-cdu.de/files/downloads/240507_cdu_gsp_2024_beschluss_parteitag_final_1.pdf.

④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Wahlen zum Deutschen Bundestag,” <https://www.kas.de/de/web/geschichte-der-cdu/wahlen-zum-deutschen-bundestag>.

⑤ 德国作为“社会国家”的特殊性使得基民盟必须在市场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之间维持平衡,这一矛盾在经济衰退时更为突出。参见 Herbert Kitschelt, “Political-Economic Context and Partisan Strategies in the German Federal Elections, 1990–2002,”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26, No.4, 2003, pp.125–152.

化,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其变革的策略和程度;最后,外交与安全议题因俄乌冲突而从边缘跃升为核心议题,与基民盟的国内经济议程和社会共识塑造深度交织,为观测该党的战略适应能力提供了关键窗口。

根据上文对左右意识形态维度的界定,右翼立场在经济政策领域通常表现为强调自由竞争,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对激进变革持谨慎态度;在社会文化政策领域通常表现为维护传统的道德观念,对现代性持相对保守立场;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则更注重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强调实力政治,并可能采取较为强硬的对外策略。因此,观察基民盟在多大程度上向更右翼的政策立场移动,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放任乃至主动推动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成为研判该党是否发生纲领性“右转”并评估其“右转”程度的有效方法。

(一)外交与安全政策:从“多边合作”到“战略自主”

基民盟于2024年5月7日在柏林召开的党代会上通过了新的基本纲领,标题为“自由生活——引领德国安全迈向未来”。作为默克尔卸任党主席之后的首次全面更新,这份纲领旨在回应党内对“后默克尔时代”发展方向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及之前的基本纲领中,外交与安全政策议题总是位于纲领的末尾,而新纲领将该部分内容提升至开篇位置。同年11月,朔尔茨领导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因预算僵局垮台并触发德国提前大选,基民盟在其随后发布的联邦竞选纲领中延续了外交与安全议题的首要地位。这一调整具有显著的政治象征意义,反映了该党在战略重心和政策导向上的深刻转变。

1.外交政策

德国的外交政策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影响,长期奉行“克制文化”,始终遵循融入西方的政策和行为模式,主流政党间分歧较小。即便在默克尔政府第三任期内,随着德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其外交政策开始展现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但这一变化在当时尚处在“量变”范畴。^① 该国以多边主义为基石的外交行为模式以及对军事手段运用极为谨慎的态度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一时期,基民盟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以地缘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在欧洲层面积极推动一体化进程,在国际层面重视维护跨大西洋关系,视其为德国发展的重要机遇;对待非西方国家则贯彻“以商促变”的理念,寻求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合作,主张通过开放和全面的对话,在“普世价

^① 郑春荣:《德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4页。

值观”的基础上建立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即使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该党 2017 年的竞选纲领中仍然强调使用非军事手段调解冲突,呼吁与俄罗斯继续保持对话。此外,默克尔时期的各份纲领也主张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支持中国和印度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和塑造者;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则以发展援助和民主建设合作为政策重点,体现出本国对伙伴国的责任而非自身利益优先的取向。

然而,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标志着德国外交政策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时代转折”。^① 作为在野党的基民盟也在此过程中进行了重大的立场调整,其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地缘政治利益。新的基本纲领将俄罗斯定义为“发动罪恶侵略战争”的国家,并首次提出“欧洲安全只能以对抗俄罗斯的方式组织”,这一表述标志着该党对俄立场的根本性转变。对乌克兰的支持则被提升至国家理性层面,承诺继续提供全面支持。这种明确且无条件的声援,超越了默克尔时期以“诺曼底模式”为代表的平衡外交传统,更接近现实威慑主义,强调通过强化军事手段维护欧洲安全架构。对华政策方面,纲领虽未直接点名,但强调需减少对“专制国家”的战略依赖,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和技术保护构建“去风险化”机制。同时,该党的发展政策也经历了根本性变革,政策重点向本国自身利益转移:非洲和印太地区被列为重点合作区域,其背后不仅包含拓展海外市场和寻求资源的经济考量,而且反映出在这些地区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意图。

2. 安全政策

默克尔执政时期,基民盟的安全政策主要聚焦国内安全。其基本纲领明确指出,自由与安全互为前提,国家需以“防御性民主”为原则应对内部威胁,包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在国际安全领域,则主张通过欧盟和北约强化多边安全框架,支持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制定全球性安全标准,遵守严格的武器出口准则,并致力于支持全球裁军和加强军备控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技术的扩散。

新纲领一方面扩展了国家安全机构(如警察和司法系统)在管控国内安全方面的职能,另一方面在防务政策上实现了根本性转型。它继续支持北约框架下的集体防御,但更加强调欧洲防务自主权。对此,基民盟承诺国防开支至少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提出“十年强军计划”,彻底改革联邦国防军结构,填补能力缺口,组建现代

^① 郑春荣:《“时代转折”中德国外交战略的转型》,载《当代世界》,2023 年第 6 期,第 50-55 页。

化、持续作战能力强的军队。这与该党历史上对军事力量运用所持的谨慎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纲领支持扩大核共享机制,推动与法国和英国共建“欧洲核保护伞”,显示出对核威慑战略的重新重视。

在目前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已基本落实基民盟所倡导的安全与防务政策改革。由默茨推动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望根植于总理府,在职能上取代现有的联邦安全理事会,标志着德国国家安全架构的重大升级。联合政府承诺将大幅加强军事力量建设,迅速提升武装力量的作战准备状态;大力支持军事技术与产业发展,通过政府间协议扩大对武器出口的支持;增强对军事基础设施的投资,指出国防应优先于其他一切公共利益与国家任务。为此,基民盟甚至不惜放弃一贯秉持的财政保守立场,与社民党联合推动改革“债务刹车”机制,为国防开支提供资金。此外,在基民盟取消义务兵役制 14 年后,联合政府再次为该制度的引入埋下伏笔。尽管协议中将此描述为“先以自愿为基础”,但明确提出以瑞典的兵役模式^①作为参照,这预示着兵役制度在未来回归的可能性。

(二)经济政策:从“平衡市场与社会”到“增长优先与效率优化”

作为德国战后政治的核心力量,基民盟经济政策的演变始终围绕“社会市场经济”这一理念展开。该理念由艾哈德(Ludwig Erhard)实践并推广,强调市场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动态平衡,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天主教社会教义与新自由主义^②的融合。

1.经济治理理念

在默克尔执政时期,基民盟的经济政策以“社会市场经济”为框架,强调“竞争秩序”与“社会任务”的结合。其纲领明确提出“市场自由需与社会公正同步推进”,主张通过税收调节(如提高高收入者税率)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实现再分配。该党推动实施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强化劳资共决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方面,该党提出在“欧盟层面协调社会标准”,反对“逐底竞争”。

进入默茨时期,基民盟纲领指出,社会市场经济需适应时代发展,主张利用创新推

^① 2018 年 1 月 1 日,瑞典恢复义务兵役制。与冷战时期的制度不同,目前瑞典的征兵制度具有选择性,且不区分性别。每个年满 18 岁的公民都必须进行兵役登记,其中每年有 10 万人接受服役筛选,但最终只有约 5% 的人服役,其余人员可以在必要时成为后备役。有服役义务却拒绝服役的公民将面临监禁。参见 Gil Barndollar, “Sweden’s New Model Army,” *Foreign Policy*, 15 March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3/15/sweden-nato-military-conscription-model-defense/>.

^② 此处“新自由主义”指德国弗赖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该理论以欧肯(Walter Eucken)为代表,强调国家构建竞争秩序,与 20 世纪 80 年代撒切尔和里根强调去监管化的“新自由主义”概念不同。

动经济增长,并将自由视为创新的驱动力。新纲领强调给予企业以自由空间来开发领先技术和应用,从而将“动态效率”置于优先地位。该纲领还将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视为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主张通过减税(企业税上限降至 25%)与放松管制激活市场活力;同时提出实施监管松绑,不仅要求废除《供应链法》及简化统计报告义务,更通过引入“反镀金法案”禁止转化欧盟指令时增设额外义务,以实质性削弱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约束力。

2. 劳动力市场政策

默克尔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呈现双重特征。一方面,其延续并深化了“哈茨改革”思路,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沿用“迷你工作”、临时工等工作形式和福利安排,为劳动者提供更灵活的就业选择。同时,默克尔政府推动积极的就业促进理念,将失业保障观念从“救济导向”转变为“促进导向”,显著加大了在就业咨询、劳动中介服务以及劳动技能培养和更新措施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政府设立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群体的基本权益,稳定劳动力市场。

新基本纲领则进一步强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新纲领提出改革《劳动法》,将日工时上限改为周工时上限,允许企业根据生产需求更灵活地分配员工工作时间。此外,引入“跨公司人事伙伴关系”(Personalpartnerschaften),允许企业在工会同意的情况下相互提供人员,打破了以单个企业为单位的人力资源封闭体系。同时,基民盟宣布推出“勤劳者议程”,通过实施一系列免税政策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和全职雇员自愿加班。在福利体系方面,纲领表现出右转倾向,提出废除公民津贴,代之以“新基本保障”,并恢复“促压结合”(Fördern und Fordern)原则,对拒绝接受工作者更快地实施福利削减甚至取消措施。

3. 产业政策

默克尔时期的基民盟产业政策展现出两个面向:一方面,重视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关键地位,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创新,提升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积极促进能源转型,设定 2022 年全面弃核时间表,并承诺到 2030 年将碳排放减少 55%。^① 在这一时期,基民盟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大力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该党明确承诺德国到 2045 年实现碳中和,通过发展绿色技术、加强碳排放交易等措施,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

^① Die Bundesregierung, “Rede von Bundeskanzlerin Dr. Angela Merkel,” 24 May 2017,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service/newsletter-und-abos/bulletin/rede-von-bundeskanzlerin-dr-angela-merkel-794854>.

新基本纲领则更突出“经济增长与竞争力强化”的目标,其显著表现是气候议程让位于工业和高科技发展。虽然纲领并未正式放弃 2045 年碳中和目标,但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展现出从行政管制退守到市场调节手段的倾向:提出扩大碳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并推动国际碳市场合作与标准统一,以避免硬性的减排指标。同时,新纲领明确反对欧盟提出的 2035 年燃油车禁令,计划通过提供研发补贴、优化产业布局等措施,确保德国汽车产业在全球市场中的优势地位。这种“竞争性去碳化”的逻辑同样体现在农业领域,纲领还反对欧盟强制推行的休耕政策,要求全面恢复对农业柴油的补贴。在能源政策领域,除支持重启第四代核能研究外,新纲领提出推迟煤电退出时间表,并使用燃气电厂作为过渡,支持包括氢能、生物能源在内的多元能源组合。在 2025 年的竞选纲领中,基民盟重点聚焦创新研发,提出通过实施“德国高科技议程”强化国家竞争力,重点发力领域包括航空航天、量子计算、太空探索、数字化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由于社民党对社会政策的重视,基民盟做出了部分妥协,比如在财政政策上未能实现大幅减税和坚守“债务刹车”目标。然而,在产业政策领域,基民盟与社民党达成基本共识,双方均以提升德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为目标,落实了包括取消“供应链法”在内的多项基民盟的核心政策主张。

(三)社会文化政策:从“多元包容”到“价值整合与选择性融合”

1.移民与融合政策

在默克尔执政时期,基民盟秉持“多元包容”理念,2007 年基本纲领强调“开放社会与文化多样性”,认可移民对德国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该党主张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移民融合,如提供免费德语课程以提升移民语言能力,为移民子女融入德国教育体系创造便利条件,支持多元文化社区建设,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保障少数群体权利,以构建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在移民管理方面,默克尔政府侧重在欧盟框架内协调移民流动,倡导“可控移民”策略,寻求在维护德国自身利益的同时,践行欧洲共同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新纲领则更突出“德国核心价值的凝聚作用”,重新强调“主导文化”(Leitkultur)概念,要求移民“无条件接受德国宪法价值观、历史认同及社会规范”。它一方面强化价值筛选与整合机制,引入福利待遇与就业挂钩的原则;另一方面加强对判定为融合失败者的惩罚力度,通过设立“联邦驱逐中心”简化犯罪移民的驱逐程序,并引入“无

限期离境拘留”等强制性措施。移民管理政策则呈现出安全化转向的特征。新纲领推行“选择性移民”策略,严格区分劳工移民与庇护移民,优先吸纳高技能人才,同时收紧避难政策,对寻求庇护者实行“配额解决方案”(Kontingentlösung)。此外,纲领还呼吁重塑欧洲移民与安全治理的规则体系,推动欧盟采纳“安全第三国”原则,由非欧盟成员国实施庇护审查程序。

移民政策成为基民盟 2025 年联邦选举中最为重视的政策领域之一,其核心政策主张在《联合执政协议》中也基本得到落实,包括在德国边境拒绝难民入境、暂停享有“辅助保护”身份人员的家庭团聚权利、取消对难民的部分遣返限制并提升遣返执行率、在第三国设立庇护申请审查中心,以及降低后续入境德国的乌克兰难民所能享有的福利待遇等措施。

2. 家庭与性别政策

默克尔执政时期,基民盟重视家庭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作用,同时也逐步接纳社会多元化的现实,主要表现为支持家庭友好型政策,通过税收优惠、育儿支持等方式给予家庭直接经济补助,强化家庭功能;在性别政策上,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促进女性在教育、就业等领域的发展,鼓励企业实施灵活工作制度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家庭与职业生活;对 LGBT 群体权益也持相对包容态度,承认同性伴侣民事结合的合法地位,并推动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理解与接纳。

新纲领延续了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重视,但更强调家庭责任与社会福利间的关联,推动家庭在社会福利体系中发挥更大的自我保障作用。同时,纲领反对所谓的“性别意识形态”,强调生物性别的不可变性,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性别中立语言,将传统家庭模式视为核心家庭形态,巩固婚姻特权。然而,在就业等经济领域,纲领仍强调为女性创造平等机会,鼓励女性参与新兴产业与高端职位的竞争,显示出该党试图在维护传统性别观念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间寻求新的平衡。

3. 宗教与国家认同

尽管基民盟是植根于基督教教义的政党,但在默克尔执政时期,该党在宗教政策方面秉持相对包容与开放的态度。基民盟鼓励穆斯林移民保持自身宗教信仰,同时通过加强语言教育、促进文化交流等政策支持其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进程,而非采取强制宗教同化的手段。在国家认同构建上,默克尔政府强调基于宪法价值观的共同认同,鼓励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在遵守德国法律、尊重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共同塑造国家认同,淡化宗教信仰差异在国家认同中的区隔作用。

新纲领中的宗教政策则发生了显著转向。纲领要求强化基督教价值观在公民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将宗教教育提升为学校的常规学科;同时,明确要求杜绝外国势力对国内伊斯兰教的渗透,强调穆斯林群体只有“共享我们的价值观”,才能被认可为德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为宗教群体的融入设置了明确的价值门槛。在国家认同塑造上,新纲领突出“主导文化”概念,强化德国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宪法价值在国家认同中的核心地位。

(四)小结

总体而言,在默茨的领导下,基民盟的纲领性政策立场较默克尔时期产生了明显的“右转”趋势,这一现象体现在外交与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个政策领域,并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见表1)。在经济领域,该党以秩序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为主导,向市场自由主义的调适幅度相对有限;在社会文化领域,尤其在身份政治与移民治理议题上,则表现出较强的议题重构力度;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由于受到地缘政治危机的直接驱动,纲领展现出最为激进的政策范式转型。这标志着基民盟正经历从“默克尔式中间主义”向融合了“主权主义”“秩序自由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三位一体意识形态的迁移。新纲领试图通过强化国家权威、推崇市场自治以及维护传统价值,回应社会碎片化带来的焦虑,其政策超越了简单的民粹化。在国内层面,这种政策转变可能会加深既有社会分歧,分化公众舆论,尤其是在移民和文化认同等极具争议性的议题上。在国际层面,它可能使德国与欧盟伙伴之间的竞合关系产生新的张力,并重塑德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安全框架中的角色定位。默茨对国家主权、经济竞争力和传统价值的关注,反映了当前欧洲的整体趋势,即传统的中右翼政党正通过向政策工具箱的右侧扩容来维持自身的代表性。然而,这种重新定位也伴随着内在风险,可能会疏远传统温和派选民,使其构建稳定的党派间联盟变得更加困难。

表1 默茨时期与默克尔时期的基民盟纲领性政策立场对比

政策领域	默克尔时期	默茨时期	立场是否右转
外交与安全	多边合作	战略自主	是,显著
经济	平衡市场与社会	增长优先与效率优化	是,一般
社会文化	多元包容	价值整合与选择性融合	是,较为显著

注:表由作者自制。

四 基民盟纲领性“右转”的动因分析

(一) 外部环境因素

1. 环境趋势: 选民偏好的转变

德国社会结构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深刻变革。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导致传统的阶级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群体规模缩小。与此同时, 世俗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教会成员数量持续下降, 宗教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也随之减小。这些社会结构的变化, 动摇了基于阶级和宗教分野的政党认同根基, 致使选民与政党之间的传统联系逐渐弱化。调查数据显示, 无党派认同者的比例从 1972 年的 20% 升至 2009 年的 38%, 且青年群体是推动这一趋势的主力军; 在同一时期具有党派认同的选民中, 表达“强/极强”认同感的比例从 55% 降至 32%。^① 这种政党忠诚弱化的现象在选举行为中体现为投票率的下降和选举波动性的提升。德国大选投票率自 20 世纪 70 年代约 90% 的高峰降至 2013 年的 71.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2009—2017 年, 选票的波动达到自联邦德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 几乎一半的选民在不同选举之间更换了支持的政党。^② 稳定的选举行为模式被打破,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个性化”或“个体化”的投票行为, 选举政治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在此背景下, “议题导向”投票成为一种在选民与政党之间相对稳定的新型选举行为模式, 即选民倾向于选择那些在对其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议题上立场明确, 且与自身立场相近的政党。以移民议题为例, 在欧洲难民危机期间, 选民对移民政策的态度成为影响其投票选择的关键因素。格特纳 (Lea Gärtner) 等人的追踪调查显示, 几乎每两个持有强烈反移民立场的基民盟支持者中, 就有一人最终放弃了对该党的党派认同。在这些流失的支持者中, 约有 37% 的人转而支持德国选择党 (AfD)。^③

作为长期主导德国政坛的中右翼政党, 基民盟在经济政策、移民治理与国家安全等关键议题领域享有显著的选民认同优势。然而, 默克尔时代实施的“中间化”战略

^① Russell J. Dalton, “Interpreting Partisan Dealignment in Germany,” *German Politics*, Vol.23, No.1-2, 2014, pp.134-144.

^② Agatha Kratz et al., “Changing Crises, Changing Votes? Problem Priorities, Party Competence, and Electoral Behavior in Germany, 2009-2017,” in Rüdiger Schmitt-Beck et al., eds., *The Changing German Voter*, p.209.

^③ Lea Gärtner et al., “Ties that No Longer Bind? Effects and Responsiveness of Party Attachments in a Period of Crises,” in Rüdiger Schmitt-Beck et al., eds., *The Changing German Voter*, pp.115-116.

在扩大选民基础的同时,也导致该党意识形态谱系的特征边界逐渐模糊,进而削弱了其作为保守主义政党的特性。在2021年联盟党遭遇大选失利后,时任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现任基民盟秘书长的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和《世界报》的采访中表示,“基民盟的核心是什么,这一点已不再清晰”,^①并强调“必须明确我们的立场”。^②其目标在于巩固基民盟在传统优势议题的所有权,并实现选民支持率的回升。而基民盟选择向右翼光谱回调其议题立场,显然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相较于向意识形态对立维度进行激进的立场跳跃,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约束的政党回归其固有价值坐标,能够有效降低选民认知失调的风险。以经济议题为例,林内曼对默克尔政府过度的大流行病援助措施的批评,表明了他在经济领域更为右倾的态度,即要求基民盟回归更为自由的经济立场,从而构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核心特征,实现选民认知的清晰化和政治支持的再巩固。

选民投票行为从传统的党派忠诚向议题导向的转变,成为基民盟政策立场调整的根本动力。这一因果关系可以通过反事实论证得到清晰的阐释:假设德国选民仍然主要基于对特定党派的长期忠诚进行投票,那么选民往往倾向于接受并认同其所支持政党的既有立场,形成一种“政党引导选民”的政治动态。在此情境下,政党无需或仅需小幅度的政策立场调整。然而,当选民转向议题导向的投票行为时,政治动态发生了根本性逆转。选民根据自身的政策立场和具体议题的偏好选择政党,形成“选民引导政党”的新格局。面对这一变化,政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主动进行变革,调整其政策立场以适应选民新的选举行为模式。

2. 环境调整:新兴政党的议题竞争

在选民越发倾向于“议题政治”的背景下,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对基民盟构成关键外部压力。2015年难民危机发生后,德国选择党通过强调移民限制和文化认同,成功占据反移民议题的主导权,吸纳了在社会文化领域因主流右翼政党中间化而产生政治疏离的选民群体。数据显示,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和自民党(FDP)这三个传统主流政党的联合投票份额从2002年的84.4%降至2017年的64.3%。^③与此同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显著上升,德国选择党在2013年的支持率未突破5%(仅为

^① Ralph Bollmann, “Wir hängen am Tropf des Staate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1 November 2021, <https://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carsten-linnemann-wir-haengen-am-tropf-des-staates-17642572.html>.

^② “Dann werden wir auch wieder gewählt,” *Die Welt*, 22 November 2021,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video235212000/Unionsfraktionsvize-Linnemann-Dann-werden-wir-auch-wieder-gewaehlt.html>.

^③ Bernhard Weißels, “Leaving the Space—Opening the Gap? Electoral Effects of Parties’ and Voters’ Repositioning,” in Rüdiger Schmitt-Beck et al., eds., *The Changing German Voter*, p.53.

4.7%)，到 2017 年已大幅上升至 12.6%，^①其中多数选票来自基民盟的传统票仓。此后一段时间，由于主流政党依然在移民问题上集体“保持沉默”，德国选择党成为持有反移民态度选民的唯一选择。主流政党的这种沉默立场源于德国的历史记忆和政治文化传统，在客观上表现为希望通过“保持沉默”来降低移民议题的显著性。然而，议题显著性不仅受政党宣传策略的影响，而且受环境事件的塑造，如 2011 年福岛核灾难与 2021 年德国洪灾后，公众对气候与环境议题的关注度均达到高峰。^② 移民议题同样如此，尽管在 2017—2021 年实际移民人数有所减少，但选民仍然认为移民是一个重要话题。在 2021 年大选前的两个月中，约有 16.5% 的调查对象持此观点。^③ 而当 2023 年年底涌入德国的难民人数达到新高时，认为移民是重要议题的选民比例一度超过了 50%。^④ 随着移民议题在公共舆论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也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自 2023 年起，在各类周日民调中，该党支持率从约 15% 开始稳步增长，最高时超过 20%，并从 2023 年年中起持续高于社民党，进而成为德国政坛中仅次于基民盟/基社盟的第二大政治力量。^⑤ 移民问题从边缘议题跃升为影响选举胜负的关键变量，这种议题显著性对投票行为的塑造力，迫使基民盟无法再“保持沉默”，开始重新评估其政策定位。

在新基本纲领完成对移民政策领域立场的重新定位后，基民盟通过党的领导层的公开讲话以及在议会中推动相关议案两种方式，与德国选择党就反移民议题的主导权展开激烈争夺。2024 年，曼海姆、索林根和马格德堡等地相继发生难民袭击事件，时任基民盟主席默茨发表了一系列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论调相似的声明。他指责朔尔茨政府“正在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呼吁总理“停止难民入境”，并声称“德国可以在不违背欧盟法律的情况下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保护内部边界”。^⑥ 2025 年 1 月阿沙芬堡持刀袭击事件发生后，默茨承诺立刻采取措施改变“德国 10 年来错误的庇护和移

① Die Bundeswahlleiterin, “Bundestagswahl 2017,” <https://www.bundeswahlleiterin.de/bundestagswahlen/2017/ergebnisse.html>.

② Lars-Christopher Stövsand et al., “Issue Salience and Vote Choice: A Cultural Turn?” p.82.

③ Hannah Alarian, “The Persistent Relevance of Immigration for German Voters,” American-German Institute, 30 June 2022, <https://americangerman.institute/2022/06/the-persistent-relevance-of-immigration-for-german-voters/>.

④ Statista,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Facing Germany?”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57188/most-important-issues-facing-germany/>.

⑤ “Sonntagsfrage Bundestagswahl,” <https://www.wahlrecht.de/umfragen/>.

⑥ “Merz wirft Kanzler Scholz Kontrollverlust vor,” *Der Spiegel*, 27 August 2024,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friedrich-merz-wirft-olaf-scholz-kontrollverlust-vor-gespraech-nach-solingen-a-00b14622-7b22-4fb8-9bcf-0fd740c74bc7>.

民政策所造成的残局”,^①公开批评默克尔的开放政策,并在竞选期间推动联邦议院对联盟党提出的两项限制移民动议和一项《限制涌入法案》进行表决,力求彻底扭转公众对基民盟在移民政策立场的认知。最终,其中一项动议在联盟党、自民党及德国选择党的支持下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尽管该动议本身不具法律约束力,但此举被认为在事实上打破了战后德国主流政党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的“防火墙”。

综上所述,选民对移民议题的高度重视为德国选择党提供了崛起土壤,对基民盟形成外部竞争压力。随着移民议题显著性的不断提升,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持续攀升,进一步压缩基民盟的中间选票空间。因此,在推动基民盟政策立场转变的过程中,德国选择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移民议题也成为基民盟“右转”较为显著的政策领域。

3. 环境事件:俄乌冲突

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与随之而来的乌克兰难民的涌入,为基民盟的政策右转提供了额外推力。这一事件通过重塑公共议程的议题显著性,将外交安全与移民治理两大政策领域推向政治竞争的核心场域,使“安全焦虑”上升为选民的核心诉求。而彼时执政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在对俄政策立场上出现明显的决策迟滞,在乌克兰难民接收与安置机制中暴露出系统性协调不足的问题,民众的不满持续发酵。基民盟为抢占“安全守护者”形象并凸显自身行动力,系统性推动外交与安全政策向现实威慑主义转向,并收紧移民限制性管控措施。这一调整既是对选民风险感知升高的直接回应,也符合该党基于路径依赖重新激活议题优势的内在逻辑。此外,俄乌冲突还导致德国能源供应链断裂与通胀压力,引发经济社会危机。联邦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经价格调整后同比下降0.2%,这是继2023年下降0.3%后连续两年出现萎缩态势。^②这为该党在秩序自由主义框架下强化市场竞争提供了合法性叙事空间。基民盟一方面通过企业减税和工业与农业扶持计划强化其经济治理形象;另一方面则以构建“绩效社会”为名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尤其针对移民群体设置福利获取壁垒。这种策略通过将经济衰退与移民问题相捆绑,消解了经济问题的阶级属性,转而将其塑造为“文化冲突”的延伸。

^① “Das Maß ist endgültig voll,” 23 January 2025,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innenpolitik/aschaffenburg-messerattacke-debatte-konsequenzen-100.html>.

^②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Down 0.2% in 2024,” https://www.destatis.de/EN/Press/2025/01/PE25_019_811.html.

俄乌冲突是推动基民盟政策立场转变的加速器。在议题导向的选举行为模式下,该党通过强烈放大选民的短期安全诉求,为自身推动军费增加、发展国防工业以及对俄强硬立场铺平道路。这使得外交与安全议题迅速突破德国传统的“克制文化”范式,成为基民盟“右转”最为显著的政策领域。从长期来看,围绕“克制文化”与实力政治、对俄制裁与对俄合作的价值观对立,可能催生新的社会分歧,进而重塑本国政治格局。相较而言,在经济政策领域,尽管俄乌冲突同样提升了议题显著性,但由于没有政党在该领域占据绝对议题所有权,实质性变革的驱动力不足。基民盟的“右转”更多体现在政策工具层面,而非根本范式的转型,因此,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得以保留。

(二)政党变革的核心机制

1. 选举失利的冲击

选举失利对以选票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基民盟来说具有重要影响。它不仅对政党凝聚力造成冲击,而且动摇了党内权力平衡的根基。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激化了基民盟与其姊妹党基社盟之间的路线分歧,并加剧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基层党员与高层精英之间的纵向冲突。

2017 年联邦选举后,尽管联盟党仍是最大的议会党团,但其选票遭受重大损失,支持率较上届选举下降超过 8%,创下自联邦德国成立以来的最差成绩。这次失利随即导致组阁困境,其中移民政策成为阻碍时任总理默克尔获得组阁所需多数的主要障碍之一。^① 各方围绕该议题的争执使默克尔的最后一届政府从一开始就陷入极不稳定的状态,并在 2018 年的政府危机中达到高潮,凸显了基民盟与其传统上更为保守的姊妹党基社盟之间的深刻分歧。彼时,时任内政部长兼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提出一项“移民总计划”,主张拒绝所有已在其他欧盟国家注册的庇护申请者进入德国境内。该立场与默克尔寻求的欧洲协调方案形成对立,默克尔担心单边行动会破坏欧盟团结并可能违反国际人权法。这一分歧导致政府内部几近分裂,泽霍费尔甚至一度在 2018 年 7 月提出辞职,最终在默克尔的斡旋下双方达成妥协,同意在德奥边境设立“中转中心”处理移民问题。^②

在 2021 年联邦选举中,联盟党再次遭遇挫败,支持率较上届选举暴跌近 9%,刷新

^① Philip Oltermann, “German Coalition Talks Collapse After Deadlock on Migration and Energy,” *The Guardian*, 20 November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nov/19/german-coalition-talks-close-to-collapse-angela-merkel>.

^② Matthew Karnitschnig, “Merkel and Seehofer Make Fragile Peace,” *POLITICO*, 2 July 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merkel-and-seehofer-strike-refugee-deal/>.

历史最差成绩。作为党主席及总理候选人的拉舍特(Armin Laschet)被要求为此承担责任。这次失利使得自2017年以来便持续存在的党内冲突面临激化为全面斗争的严峻局面,主要表现为较为保守的基层党员与柏林方面支持现代化的党内领导层之间的纵向冲突。^①拉舍特及其前任党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均被视为默克尔“中间路线”的继承者,他们都是在传统共识导向的党内民主模式下,由党内高层精英通过闭门协商方式选出的。^②然而,其领导基民盟的努力均告失败,引发党内对党主席选举程序以及拉舍特作为总理候选人任命程序的不满,进而催生了支持党员更广泛参与党内决策和人事变动的呼声。在2021—2022年的党主席选举中,基民盟首次采用党员调查^③形式进行投票,其结果深刻凸显了党内纵向冲突的严重性:此前在两次选举中均告失败的默茨在第一轮投票中即获得绝对多数(62.1%),^④远超其余两位候选人。这种由党员以基层民主方式直接选出新任党主席的方式,使基民盟党内的紧张气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如上所述,选举失利是基民盟政策调整的直接导火索。相较于选民偏好的转变与新兴政党议题竞争的显现,选举失利作为一项明确且可量化的指标,更容易被党内精英共同认知,从而形成新的党内共识并开启变革进程。然而,这也存在例外情况,例如有些政党能够前瞻性地预判新兴政党的威胁并迅速转变政策立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民盟在2017年遭遇选举失利后,并未立即开启实质性变革。其原因可能在于当时党内权力仍由默克尔所在的“中间路线”派所主导,未能就新的政策方向形成足够的多数共识,阻碍了立场的及时调整。

2. 主导派别更替

在基民盟内部,除纵向冲突外,还存在一种横向维度的冲突。该党长期以来将自身定位为“中间的全民党”(Volkspartei der Mitte),能够较好地凝聚广泛的跨阶层联

^① Benjamin Höhne, “Mehr innerparteiliche Demokratie wagen, Wahlen zum Parteivorsitz in CDU und SPD,”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https://www.kas.de/de/einzeltitel/-/content/innerparteiliche-demokratie-bei-den-wahlen-zum-parteyvorsitz-von-cdu-und-spd>, p.29.

^② 尽管自2017年以来基民盟在党主席选举过程中已经引入“地区会议”等民主化因素,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员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党主席选举由政党精英主导的传统模式。参见 Benjamin Höhne, “Mehr innerparteiliche Demokratie wagen, Wahlen zum Parteivorsitz in CDU und SPD,” pp.14–22。

^③ 尽管这一进程是由党内精英发起的,更像是为平息党内冲突而进行的危机管理,但党员调查(Mitgliederbefragungen)因其较高的参与率和直接反映党员意志的优势,已成为党内民主化的最重要因素,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党主席选举模式。参见 Benjamin Höhne, “Mehr innerparteiliche Demokratie wagen, Wahlen zum Parteivorsitz in CDU und SPD,” pp.24–29。

^④ CDU Deutschlands, “Merz ist designierter CDU-Vorsitzender,” 17 December 2021, <https://www.home.cdu.de/artikel/friedrich-merz-ist-designierter-cdu-vorsitzender>.

盟。其组织结构高度联邦化,各州的支部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大致可分为支持福利国家的社会派、重商的市场派、民族和文化保守派以及文化进步派。^① 这种横向冲突从本质上反映了保守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对立,并在组织层面上表现为亲商保守派与社会进步派之间的博弈。

如果说默克尔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尚能维持党内脆弱的团结,那么在后默克尔时代,党内保守派的声音已难以被压制。两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在 2020 年的图林根州危机中达到顶点。在该州选举中,地方基民盟议员为阻止左翼党候选人上台,默许接受德国选择党的支持,公然无视时任党主席卡伦鲍尔关于解散州议会并重新举行选举的要求,致使联邦党部与地方组织陷入公开对立。这场危机直接导致卡伦鲍尔辞职,党内保守派借此攻击其领导能力,并将此视为默克尔路线的失败。这一危机为默茨在 2022 年当选党主席提供了契机,标志着保守派在党内权力格局中的重新崛起。部分极端保守力量还积极建立“价值联盟”(Wertheunion)组织,试图推动党内右转。该组织成立于 2017 年,强调传统基督教价值观、爱国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严格的移民政策,曾多次批评默克尔在经济和文化议题上的中间路线,并支持默茨的保守立场。^② 虽然该组织因与德国选择党关系密切而不被基民盟所承认,但其崛起本身反映了基民盟党内保守派对于回归政党传统根基的强烈诉求。

默茨接任党主席后,党内保守派力量得到巩固。2022 年 2 月,默茨任命林内曼为纲领制定委员会主席,负责起草基民盟的新基本纲领。后者自 2013 年起担任党内中小企业与经济联盟(Mittelstands- und Wirtschaftsunion)的主席,被认为是“保守派和亲商派”的代表人物。^③ 2023 年 7 月,林内曼接替被媒体称为“社会自由派”的查亚(Mario Czaja),出任基民盟代理秘书长,并在 2024 年的党代会上正式当选为秘书长。本次党代会还选举产生了 5 位副党主席和 7 位执行委员会成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机构中,来自德国东部联邦州的保守派政治家获得了压倒性的高票支持:图林根州基民盟领导人(自 2024 年 12 月起担任图林根州州长)沃伊特(Mario Voigt)的得票率为 90%,萨克森州州长(在 2024 年州选举中连任)克雷奇默(Michael Kretschmer)则

① Clay Clemens, “Modernisation or Disorientation? Policy Change in Merkel’s CDU,” *German Politics*, Vol.18, No.2, 2009, pp.121-139.

② “Chef der Wertheunion bevorzugt Merz als neuen CDU-Chef,” *Die Zeit*, 31 October 2018, <https://www.zeit.de/news/2018-10/31/chef-der-wertheunion-bevorzugt-merz-als-neuen-cdu-chef-181031-99-602003>.

③ Philip Brost, “Merz tauscht Generalsekretär aus: Linnemann soll CDU-Profil schärfen,” 11 July 2023,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linnemann-cdu-generalsekretaer-100.html>.

获得了 87% 的选票。^① 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年轻一代的自由派州长为核心的党内反对派力量,如北威州的武斯特(Hendrik Wüst)和石荷州的京特(Daniel Günther)也选择支持默茨成为 2025 年联邦大选的总理候选人。

选举失利与外部竞争压力不可避免地激化了党内派系矛盾,并引发权力的重新分配。在基民盟内部,这一过程尤其体现在东部联邦州的保守派精英在党内权力的增长方面,这与东部联邦州面临更保守的选民偏好以及来自德国选择党更严峻的选举威胁密切相关。2021 年的联邦选举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现状:基民盟在东部各州的支持率几乎全部落后于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德国选择党甚至成为第一大党。^② 相对而言,基民盟在西部各州的情况则好得多。因此,提升东部州支持率的重要性在党内决策过程中显著上升。

3. 领导人变化

2022 年默茨当选基民盟党主席,标志着默克尔时代中间路线的终结。作为与默克尔同时期的政治家,默茨早年的从政经历可谓一帆风顺。他于 1989 年当选欧洲议会议员,1994 年进入德国联邦议院,并于 2000 年不满 45 岁时接替其政治“伯乐”朔伊布勒,担任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默茨以其鲜明的保守立场著称,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收,同时强调个人责任与传统家庭价值观,反对同性婚姻,支持保守的家庭模式;在移民问题上,主张更严格的控制与同化政策。鉴于此,他被视为基民盟传统建制保守派和亲商派的代表。在默克尔任期,默茨曾多次批评其政策,认为移民、能源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偏离了基民盟的保守路线,尤其对默克尔在 2015 年难民危机中的宽松政策持强烈反对态度。正因为与默克尔的政治路线存在分歧,默茨的职业生涯始终与默克尔形成鲜明对照:2002 年默克尔取代其成为联盟党议会党团领袖后,默茨被迫退出核心决策层,并于 2009 年淡出政坛,转向商界;直至 2018 年默克尔宣布不再竞选基民盟主席,才为默茨重返政坛提供了契机。彼时,默茨宣布参选党主席,试图推动基民盟向右转。相较于其他候选人,这位政治“局外人”采取了一种巧妙的竞选策略,他以默克尔“中间路线”批评者的形象出现,将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归咎于此,同时避免对该问题承担责任,从而收获了部分心怀不满的党员的支持。

^① Kamil Frymark, “A Return to Conservatism: The CDU’s New Platform,”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8 May 2024,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24-05-08/a-return-to-conservatism-cdus-new-platform>.

^② The Federal Returning Officer, “Bundestag Election 2021,” <https://www.bundeswahlleiterin.de/en/bundestagswahlen/2021/ergebnisse/bund-99.html>.

持。其支持率随着公共舆论和党内日益增长的保守声音而逐渐走高,并在 2021 年基民盟大选失利后达到高峰。2022 年 1 月,他第三次参选党主席,获得中小企业与经济联盟、青年联盟、东部和西南部等较为保守的州的支持,最终以压倒性优势当选。默茨的上台可以被视为基民盟向更保守方向转变的重要标志,反映了党内对默克尔中间路线的不满以及对自由市场和保守主义价值观回归的期待。

领导人更迭是党内主导派系变化的重要体现,它既表明权力博弈达到了新的平衡,也意味着新的主导力量能够通过制度渠道巩固和扩大其优势地位,从而为后续的政策调整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在此背景下,领导人个人的政治风格与公众形象变得越发重要。默茨政治“局外人”的身份以及与美国黑石集团的密切关系,使其在部分选民群体中形象不佳。这些选民尤其对默茨在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倾向性持怀疑态度。这种负面认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民盟在经济政策立场上实现更深程度的“右转”。相较之下,默茨在外交与安全、移民与庇护政策的立场主张,被认为更符合当前选民的偏好。因此,基民盟在这些领域的政策立场转变更加彻底。

(三)小结

基民盟的纲领性“右转”是多重内外压力交织的产物。从外部因素来看,德国选民结构的演变和议题偏好的变迁构成了根本动力:移民管控、经济增长等议题取代了气候议程,成为公众关切的核心,选民越发倾向于选择在其关切议题上立场与自身相符的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进一步催化了这一趋势。该党凭借反移民、反建制的立场,在东部联邦州的支持率突破 30%,分流了基民盟的保守选民基础。然而,德国选择党存在的合法性缺陷,也为基民盟留下了政策右转的政治空间。2021 年联邦选举中基民盟的失利成为政策调整的直接导火索,暴露了该党在中间选民中的失势,倒逼其进行重新定位。俄乌冲突这一突发事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如能源危机、通胀压力及乌克兰难民潮),则放大了公众对“交通灯”三党联合政府治理能力和政策立场的广泛质疑,加速了基民盟政策立场的右转进程,旨在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引发了党内权力重构。默克尔时代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中间路线,虽在其执政期间有效维持了政党团结,但也长期压抑了党内传统保守派在身份政治与秩序议题上的诉求。借由外部危机的冲击,保守派得以重新凝聚力量,推选出代表自身利益的领导人,并夺回了议程设置的主导权,将“秩序”和“安全”等概念重塑为政党身份认同的核心符号。

五 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哈默尔与琼达提出的政党变革整合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对不同外部环境变量的考察,构建了由“外部环境因素”与“核心机制”构成的政党变革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不同类型的环境因素影响政党变革的机制和路径。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本文对德国基民盟的纲领性转向现象进行了分析。默茨领导下的基民盟相较于默克尔时期呈现出明显的“右转”趋势。其中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变化最为显著,由对“克制文化”的坚守转向现实威慑主义;社会文化领域次之,由有限的“多元包容”转向“民族保守主义”;经济领域的转变程度最轻,在继续坚持市场与社会平衡的前提下适度“自由化”。

本文认为,基民盟的纲领性“右转”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折射出欧洲中右翼政党面临的共性挑战。在选民偏好极化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议题侵蚀的双重挤压下,传统中右翼政党陷入“代表性困境”:既要维系跨阶级联盟传统,又需向选民明确传达政党立场并应对民粹主义势力对其核心议题领域(如移民管控、文化认同、安全治理)的争夺。这种困境在选举失利的催化作用下,常触发党内权力结构的重组,体现为党内反对派与建制派围绕“保守”与“现代”价值排序调整的博弈。在此过程中,突发性环境事件作为外生冲击变量,通过改变政治机会结构加速党内主导派系的更替进程,促使政党选择更具保守特征的纲领重塑策略。近年来,法国共和党、西班牙人民党等欧洲传统中右翼政党纷纷右转其政策立场,这在欧盟层面表现为欧洲人民党党团的立场右倾,及其与欧洲保守与改革者党团(ECR)的适度靠近。

从短期来看,这一策略虽有助于中右翼政党暂时突破选举困境,但对政党体系产生了结构性冲击。首先,传统中右翼政党与右翼民粹势力的政治隔离机制面临侵蚀风险。在德国,基民盟虽然始终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但其在移民政策立场的右倾客观上模糊了与后者的界限。2025年联邦大选中,该党接受德国选择党的支持从而通过一项限制移民的动议,被其他政党视为在事实上突破了不与德国选择党合作的“防火墙”。在法国,共和党党魁于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公开表示愿意在国家层面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联盟结盟。而在奥地利、意大利、瑞典、芬兰和荷兰等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与中右翼政党分享了政治权力。其次,联盟政治中的治理张力显著增强。当中右翼政党选择与社会民主党等中左翼力量组建联合政府时(如德国现政府

“黑红联盟”),其右转带来的政策立场鸿沟将直接冲击执政联盟的稳定性。这种矛盾在经济和移民领域尤为突出:中右翼政党为巩固财政稳健形象往往坚持债务约束机制,而中左翼联盟伙伴则致力于扩大社会支出;在移民政策领域,中右翼政党为维系党内团结亟需取得“象征性胜利”,而中左翼政党基于进步主义立场倾向于推动包容性改革。这一幕已在德国“黑红联盟”的组阁谈判中上演。最后,政党体系的极化进程加速。2025 年德国联邦大选结果表明,基民盟的右转在短期内不仅未能遏制德国选择党的扩张,反而强化了这一趋势,并对其他传统中间党派造成更大打击。从长期看,右转后的基民盟能否有效抑制德国选择党的发展,取决于该党执政后政策落地的实际成效,尤其在移民政策方面。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政治实践表明,若中间派选民对中右翼政党的政策执行效能感到失望,他们将持续向政治光谱两端靠拢,从而加速中间地带的坍塌。

因此,欧洲中右翼政党能否维持主要大党地位并实现长期执政,取决于其在选民最为关注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移民政策和经济政策领域的执政效能。若这些政党能够通过纲领性“右转”与高效的政策执行力缓解选民的核心焦虑,则其在未来选举竞争中遏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重构政治共识的可能性将显著提升。

(作者简介:郑春荣,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王妍俐,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齐天骄)